

姚邦藻 主编

徽州学概论



黄山学
徽州文化研究所编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姚邦藻
主编

徽州学概论

欧逢方



黄山学院

徽州文化研究所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徽州学概论/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编,姚邦藻主编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0.12(2003.9重印)

ISBN 7-5004-2916-9

I. 徽… II. ①黄… ②徽… III. 文化史-研究-安徽
IV. K29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9652 号

责任编辑 周兴泉

责任校对 王应来

装帧设计 木子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

邮编 100720

电话 010-84029453

传真 010-84017153
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1201 印刷厂

版次 2000年12月第1版

印次 2003年9月第2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18

插页 6

字数 465千字

印数 6001—21000册

定价 32.00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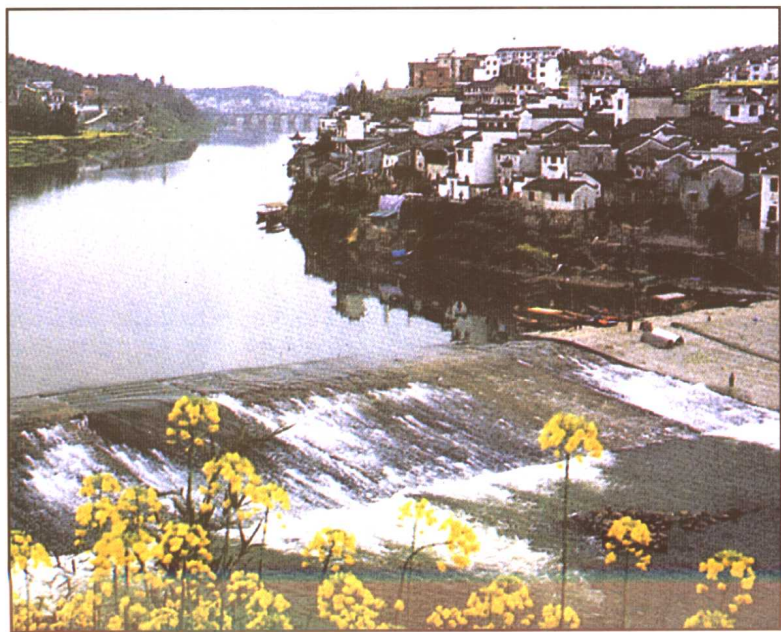
發揮地利優勢
促進徽學研究

中國社會科學院徽學研究中心周紹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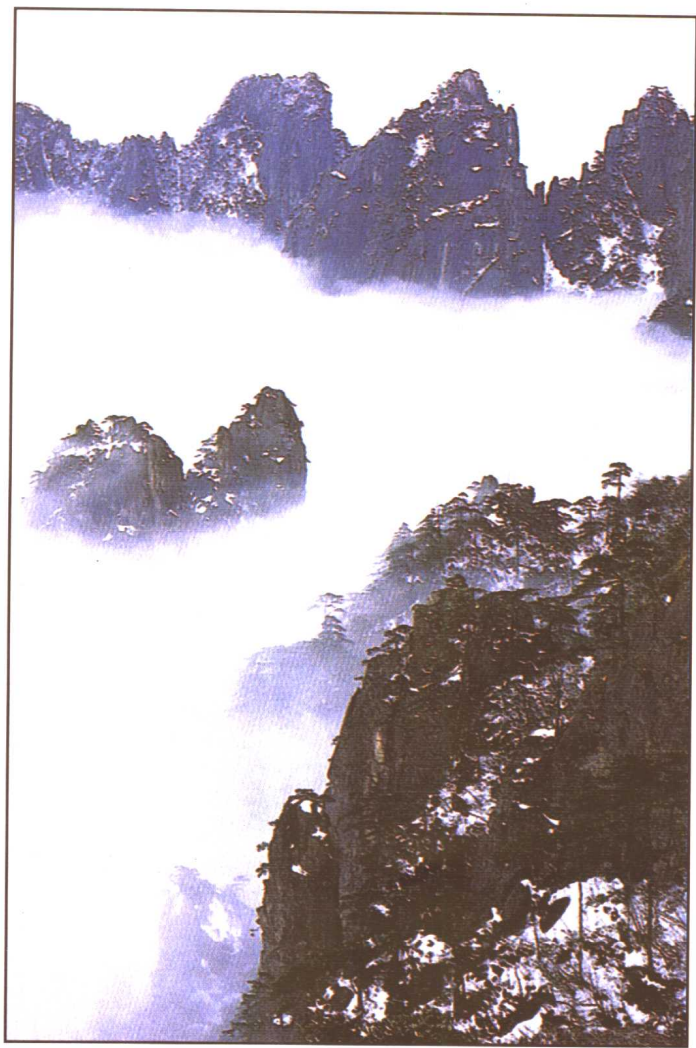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道教胜地，山与云齐。休宁齐云山



歙县渔梁坝，当年徽商走出徽州的重要码头



徽州的黄山，古称黟山，传说轩辕黄帝在此炼丹而得名



中国画里的山村。世界文化遗产徽州古村落黟县宏村



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徽派民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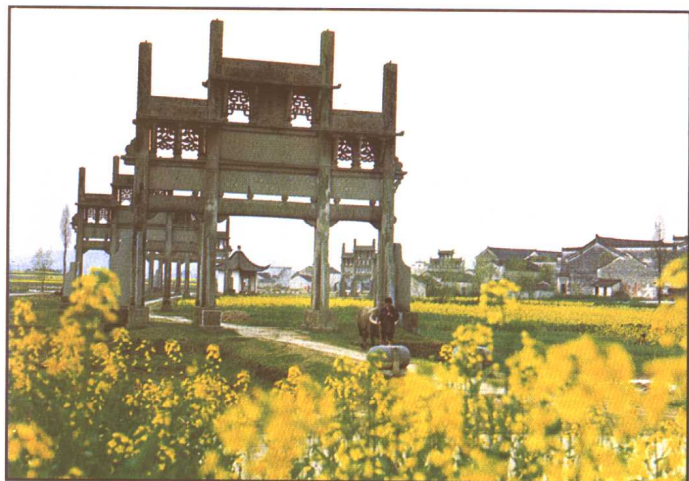


徽商之家“民间故宫”，徽州古建筑代表作黟县际联承志堂



绩溪龙川胡氏宗祠

歙县棠樾牌坊群



砖雕和石雕、木雕、
竹雕是徽建四绝



有东方凯旋门之誉的歙县
许国石坊



活动着的“清明上河图”——屯溪老街



徽州古紫阳书院

编 委 会

顾问 白 盾 秦效成 汪昭义 汪柏树
张脉贤 封安林 黄 澍 徐亚君
程嘉兴

主编 姚邦藻

编委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德中	王国键	方利山	方春生
江巧珍	刘文开	毕民智	李 俊
汪大白	吴伟逸	吴兆民	何 峰
张家仪	金家恒	周筱华	胡善凤
胡德明	洪少锋	赵本一	程观林
曾小保	翟屯建		

序 一

叶显恩

明清时期，人们每当提起徽州，便眉飞色舞，赞叹不绝，谓之“人文郁起，为海内之望，郁郁乎盛矣！”誉之为“东南邹鲁”。时人幻梦身临其境，一睹其风情。诚如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所感叹的：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！”

近年来，徽州的历史价值又重新闪现。到黄山观光的人，不仅乐于观赏黄山的胜景，尤其被徽州那与大自然相协调的古建筑、讲究风水的村落格局、充满儒学的人文氛围所陶醉，流连忘返，沉浸于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回味。

被誉为“古建三绝”的明代石坊、祠堂、宅第，既隐含着徽商雄厚的经济背景，也反映出集建筑、书画、雕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之高超。以风水林作屏蔽的祁门松潭村、九龙进村的歙县槐塘等等村落布局，透露出风水设计师的匠心独具。从院落、古井、古街、小桥古道，到室内陈列的古字画、古家具、古器皿，乃至于徽刻的书籍、大量的民间契约文书，都浸透着独特的浓郁的儒商文化和宗族文化。正是这些既有气势雄伟的风格，又有玲珑剔透气息的地面文物，相映成趣，吐露着历史的韵味和时光的价值。丰富的徽州地面历史文物，隐含着其先人亮丽的业绩，折射着多彩多姿的传统历史文化。它为我们打通了时间的隧道，从一个角度展示着明清时代的风貌。徽州，对治史者而言，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必读的活书。

璀璨于明清的徽州文化，以当时的文物为载体躲过劫难而被保留下来，表现了徽州人珍惜文化的情怀。流传于世的明清文献

和民间契约文书，明清族谱等，其数量之巨，在国内无以出其右者。大量民间文书契约的发现，弥足珍贵。它记录了习以为常，为官书和文人所乏载的社会情态——唯其司空见惯，才被视为不值一书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反映民间日常生活、基层社会关系的文书契约，弥补了图书典籍记载之不足，为我们研究乡村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。这是我们重建明清徽州地域社会史所必备的、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。唯有了这些资料，这一研究才有了可能。

正由于徽州民间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，传世的明清族谱及其他文献资料的异常丰富，又有大量明清历史文物被保存下来，从此可窥见徽州多彩多姿的历史文化。所以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一个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——“徽学”（或称“徽州学”），才勃然兴起。

“徽学”的兴起，当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为其直接的导因。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尤其五六十年代间，20余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民间契约的发现，无疑是学术界的盛事，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继甲骨、汉简、敦煌文书、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。它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学者投入这一研究。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，严中平、梁方仲等学术界老前辈，已看出其研究价值和学术前景，于是令笔者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，并耳提面命，多方教诲。不期与徽州结下不解之缘。三十多年来，前半段时间几乎沉浸在徽学的研究之中，后半段虽转入珠江三角洲的研究，但也没有忘情于徽学的课题。由于与“徽学”难解的情结，以及对“徽学”命运的关注，笔者在1984年撰写的《徽学在海外》（刊于《江淮论坛》1985年第1期）一文中，曾预言，“徽学”必将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学术。所幸为笔者所言中，“徽学”果然已经不是80年代初之前那样由少数人所耕耘；短暂的十几年间，徽学日渐茂盛，枝叶扶疏。其研究成果，丰硕繁多，新见迭出，徽学已经成为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。1999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被选定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，标志着“徽学”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

为国家所确认。在国际上,愈来愈多的学者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,不同学科的中外学者络绎不绝地、乐而不疲地前往徽州作实地考察,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。从对徽州原始文书的关注,到研究课题的拓展,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这从1993年以来先后在黄山举办的三次国际性会议就可以看出来。每次会议都有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等国家,以及台、港、澳等地区的学者出席,其规模皆在一百人左右。相应出版有《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》、《'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和《'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等三部文集,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徽学研究的国际水平。1999年12月在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召开的“徽州历史档案与徽州文化国际研讨会”,也充分表达了国际上学者对徽学的重视和兴趣。

徽学在学术界的勃兴及其展示的前景,吸引着广大读者的关注。为推进徽学研究并飨读者,安徽省决定撰写多卷本的《徽州文化全书》,由卢家丰副省长担任编委会主任,由国内四十多位徽学专家组成编撰小组,分工撰写。全书共分徽州土地所有制、徽州宗族制、徽州商人、徽州科技、徽州朴学、徽州工艺、徽州建筑、徽州民俗、徽州戏剧、徽州版画、徽州篆刻、徽州刻书、徽州文献、徽州历史档案、徽州教育、徽州村落、徽州方言、徽州历史人物、新安画派、新安理学、新安医学和徽菜等22卷,早在1998年已经着手研究撰写。各卷完稿后将独立成书出版。此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反映徽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读物,对专业史学工作者又具有参考价值,这是一部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工程。

但是,它是一部近一千万字的长篇巨著,一般读者只能挑选感兴趣的分卷阅读,难以有充裕的时间读完全书。职是之故,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单位之一黄山高等专科学校(今黄山学院)徽州文化研究所,发挥其处于徽州的区位优势,利用其熟悉本土掌故、又便于作实地调查的特点,集中科研人员的力量,经过四年多的时间,终于写出四十多万字的《徽州学概论》一书。此书既

对徽学的涵义、研究对象和范围，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等提出看法，同时介绍了目前史学界关于徽学涵义的不同观点的辩论，尤其用大量的篇幅对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，逐一作了简括的论述。前述的《徽州文化全书》提到的分卷内容都有论及。此书既从总体上对徽州文化作了宏观的探讨，又分别对徽州的自然生态环境，徽州人的由来，气质及其特点，极具特色的徽州宗族制，称雄中国商界 300 年的徽商，明清徽州科技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，徽州历史上灿若群星的杰出人物，等等，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，具有普及性、通俗性和学术性的特点。

本书可谓是一部对徽学、徽州文化作全面论述的著作。它不仅为一般的读者提供一部关于徽学、徽州历史文化的简括的读物，而且对徽州历史文化爱好者可起导读的作用，就是对史学工作者也是饶有参考价值的。

由于本书涵盖面广，涉及的问题繁多，缺失或待商榷的地方在所难免。对提出的一些问题，或则需要发掘更多的资料加以考据与验证，或则需要时日作深入的思考以完善。有的问题，其本身就具有张力与弹性的特点，受时空和主观条件的制约。

例如，徽学（徽州学）的涵义，窃以为就是一个有张力的、弹性的概念。往往根据不同的时期，不同的条件，以及学者自身的视角与理解，作出概述。一般地说，总是从简到繁，从粗糙到精细，且不断地扩大范围。在 80 年代中期，基于当时的情况，我曾提出徽学的研究对象是徽州社会经济史。重新审视，此说显然过于狭窄，当时是从自身专业的角度考虑的。今日，徽学的同仁主张对徽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扩展，是完全有必要的。徽学是一千秋万代的事业。随着文物和文献资料发掘的增多，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变化，未来徽学的涵义必将更加扩展，必将包含更多新的内容。一门学科，需要日新而日日新，这是学术的生机所在；因循守旧，囿于陈说而故步自封，必致僵化而终归消亡。

作总体史观的区域体系（Regional System）的分析和作专题、

个案研究相结合，是目前徽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基于徽州区域历史发展的典型性，作区域体系的分析尤显得必要。但整体的综合研究与部分的专题分析，应当是同时并进，彼此互动的。离开整体来研究部分，或缺乏专题和个案的研究而企求对整体的把握，都有可能是徒劳而无功的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有些问题，既持之有据，引出的结论也是合乎逻辑性的；但置于徽州的总体历史看，却与相关的其他问题相悖。例如，关于徽商的生活，以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等文献记载为据，得出的结论是花天酒地，极端奢侈。但如果放宽视野，把徽州地区的风习、徽人的贾道、官商互济的成功要诀等等都纳入考察的范围，那么得出的结论似应当是，其奢侈之举，是出自为攀附权贵，或抬高自身以取信于人的公关目的。这一看法似可反映其奢侈的事实，又可与“徽骆驼”的俭朴精神兼容不悖。由此可见，当专题与总体史的结论有冲突时，往往是或专题的结论偏颇，或总体的分析欠妥。只有通过两者的互动，彼此检验，才有可能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。

在作区域体系分析中，一个引人注目的是，明清时期的徽州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方面，取得了高度的整体性协调发展，是明清时期区域总体全面发展的典型代表。我们还未曾发现有一处可与之相比拟的区域。徽州能取得如此高度的整体全面发展，显然同徽州区域内部总体结构的优化，以及各方面保持协调发展有关。如果对之作认真的研究，徽州总体结构优化的内涵及其保持协调发展的原因，当可得到揭示。

徽商是徽州历史全面高度发展的支点。已故的张海鹏先生说，中原文化的积淀，是徽州文化的基因，加之当地固有文化因子的融入，形成徽州文化深厚的底蕴；徽州文化的发达，则源自徽商的“酵母”。事实上，徽商雄厚的经济力量，和徽州地区的总体全面发展，两者间是密切关联的。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，导致徽商重视对文化的全面投入。人才的大量培植，既促进了文化的全面发展，又结下了“官商互济”之果，就是徽州文化的亮点之一，即

高雅与通俗文化艺术共存共荣的特色，也同徽商处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接榫处的特点有密切关系。这是由于受徽商雅俗共赏的文化观念驱使，在倡导高雅文化的同时，没有忘情于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扶持与投入的缘故。可以说，徽商的历史作用几乎渗透到当地的各个方面。

关于徽商的论著甚丰，要深入一步，极有赖于深挖与扩大有关的研究资源，或作细致的徽商个案研究，或另辟蹊径，采用新的视角，新的方法，以求有所创新与突破。例如，徽商在明中叶的崛起，本是一个学术界关注的老问题，且作了富有成果的研究。但是，回首审视，投放的眼光似乎还没有放在由于新大陆的发现 and 东方航线的开通，预兆着全球一体化的高度去考察明中叶的历史背景。被人称为“倭寇王”的歙县人王直，本是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商人。他是因请求朝廷开放海禁遭到拒绝后被迫进行海上劫掠活动的。如果站在16世纪国际贸易新形势的制高点来加以审视，当更能把握嘉靖年间所谓“倭寇”的实质。又如，当我们探讨徽商与海上贸易的关系时，往往局限于海盗式的走私贸易，而缺乏对徽商全面参与海贸及其海陆相结合的关注。东方航线的开通，导致跨越太平洋的联系——中国与美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出现。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继点“马尼拉丝市”的建立，有力地刺激了中国江南地区的蚕丝业，并由此而引发了江南地区的商业化。作为徽商商业活动基地的江南地区，在与马尼拉进行丝货与白银的贸易中，徽商自当不会袖手旁观。据西人裴化行在《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》一书记载，嘉靖年间，“商业的利润被原籍属广州、徽州、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。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，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”。从此可见，徽商在当时的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市广州与外商联系密切，其势力是雄厚的。文献记载中有云，“远服南越，与岛夷为市”，说明徽商在同南海弧形岛国的海上贸易中也是占有份额的；提到海商时，历史文献上有“闽广徽浙”并提的记载。沿海的福建、广东、浙江是海商的